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

——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倪晓姗 郑春荣

摘 要：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关键词：德国；安全政策；话语分析；论式；联邦国防军外派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所长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751.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2-0004-19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究”（批准号：14BGJ009）资助。

一、引言

对于东西方冲突结束和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安全政策),学界普遍认为其呈现出一贯的延续性。然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例如赖讷·鲍曼(Rainer Baumann)通过对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话语的研究,确证了德国多边主义话语的变迁。他认为,虽然德国继续秉承多边主义原则,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积极融入各种国际组织,但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又发生着系统性变化:基于义务的多边主义政策逐渐被基于实用性的多边主义政策所取代,或者说德国追求多边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德国自身对赢得影响力和身份地位的需求,由此多边主义政策降格为一种可选项甚至被工具化^①。与此相应,沃尔夫·冯·克劳泽(Ulf von Krause)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已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对此的例证是,1990年后北约“援助义务”框架以外的联邦国防军外派行动数量增加,军事力量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投入使用。京特·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则进一步指出,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更迭、施罗德(社民党)总理上台后,德国安全政策逐渐出现了地域上的扩展和功能上的重新诠释:本国领土防御的定位被保障和推进东欧、东南欧的民主转型和遏制暴力所取代,威慑和领土防御功能被“前摄性危机预防策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策略”所替代^②。

上述学者的论断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人们如今或许可以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变迁与否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毕竟德国1998年以来在安全政策领域的诸多重大决定提供了人们做判断的依据。

本文的核心设问在于,从施罗德时期到默克尔时期,德国在安全政策行动中的自我定位有无呈现出某种转变?为了转换研究视角来进行佐证,本文尝试从德国政治精英围绕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的议会辩论,即安全政策话语来折射这一变化。

二、研究框架

国内迄今的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从政治学理论尤其是从角色理论出发,分

^① Rainer Baumann, *Der Wandel des deutschen Multilateralismus: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Baden-Baden: Nomos, 2006, S. 167-168.

^② Gunther Hellmann, „Sicherheitspolitik“, in Siegmund Schmidt/Gunther Hellmann/Reinhard W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S. 605-617, hier S. 612.

析德国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①,抑或是分析德国外交中价值与利益这两个因素的互动关系^②。近年对德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的积极有为新动向的分析上^③,但是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相关政府文件的内容分析以及与外交行动的对照。

事实上,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时期内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领域,进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领域。德国学者开始借助论据(Argument)、论证(Begründung)和论证模式(Argumentationsmuster)或论式(Topos/Topoi)^④概念研究议会辩论和公众辩论,获取和分析社会中的集体性知识^⑤,使用语言学方法为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政治学研究服务。例如,政治语言学最初的系统性研究代表之一,霍尔斯特·鲁格勒特(Horst Grünert)在1974年发表了结合论证分析与传统关键词分析对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首个全德议会辩论进行研究的专著^⑥;21世纪,尼克拉·霍齐兹(Nicoline Hortzitz)将词汇和风格分析融入论证分析,对1450~1700年的反犹太人话语展开研究,比较了近代早期反犹主义话语中的核心辩论方法和19世纪种族主义推理方法^⑦;马丁·文格勒(Martin Wengeler)对1960~1985年德国移民话语中的媒体篇章进行分析,归纳出24种论式,推动了通过论式分析获取社会中集体性知识、意识倾向和文化刻板印象的研究范式^⑧。

论式区分为普遍论式和特殊论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的、以抽象的推理规则为基础的论式是普遍论式;包含具体内容的、以具体的推理规则为基础,且在特定的领域和语境中被使用的是特殊论式^⑨。因为本文围绕德国安全政策话语展开,所以这里引用的论式概念指在话语中频繁出现的、包含特定推理规则的特殊

① 参见熊炜著:《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王友明:《评析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53-58页。

③ 参见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9-22页;郑春荣:《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4-151页;周瑾艳:《德国与非洲安全合作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44-68页。

④ 论式的定义有很多,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论证模式的同义词,以下统一使用“论式”这一概念。参见Ruth Wodak u. a., *Zur diskursiven Konstruktion nationaler Identität*, Berlin: Suhrkamp, 1998, S. 77.

⑤ Thomas Niehr/Jörg Kilian/Martin Wengeler (Hrsg.), *Handbuch Sprache und Politik. Bd. 1*, Bremen: Hentzen, 2017, S. 263.

⑥ 参见 Horst Grünert, *Sprache und Politik: Untersuchungen zum Sprachgebrauch der „Paulskirche“*. Bd. 1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4.

⑦ 参见 Nicoline Hortzitz, *Die Sprache der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450-1700)*,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05.

⑧ 参见 Martin Wengeler, *Topos und Diskurs: Begründung einer argumentationsanalytischen Methode und ihrer Anwendung auf den Migrationsdiskurs (1960-1985)*,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3.

⑨ 同上, S. 181-182.